

Beyond the Miracle
of the Mark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 in Kenya
Robert H. Bates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超越市场奇迹
——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美]罗伯特·H.贝茨 著/刘骥 高飞 译

CAMBRIDGE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主编/朱天飏 执行主编/曹海军 刘骥

超越市场奇迹

——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美]罗伯特·H. 贝茨 著 刘骥 高飞 译

Beyond the Miracle
of the Market

Robert H. Bates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主编/朱天飏 执行主编/曹海军 刘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Beyond the Miracle of the Mark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 in Kenya, 1st (ISBN 0-521-61795-2)

by Robert H. Bates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Beijing Branch 2009

本书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销售。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60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市场奇迹：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 (美)

贝茨 (Bates, R.H.) 著；刘骥，高飞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7

(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书名原文: Beyond The Miracle of The Mark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 in Kenya

ISBN 978-7-80762-995-5

I. 超… II. ①贝…②刘…③高… III. 农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肯尼亚 IV. F342.4 F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5064号

书 名：超越市场奇迹——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著 者：[美]罗伯特·H.贝茨
译 者：刘骥 高飞
出 品 人：周殿富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曹海军
责任编辑：顾学云
封面设计：SDDoffice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16.25
版 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80762-995-5
定 价：27.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国际编委会

Ha-Joon Chang(剑桥大学经济学院)

Peter Evan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Peter Gourevitch(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Stephan Haggar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Peter Hall(哈佛大学政府系)

David C. Kang(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

Peter Katzenstein(康乃尔大学政府系)

Michael Man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

Atul Kohli(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

Margaret Levi(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

John Mathews(麦考瑞大学管理学院)

Joel Migdal(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

Gregory Noble(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Ove Pedersen(哥本哈根商学院商业与政治国际中心)

Adam Przeworski(纽约大学政治学系)

Herman M. Schwartz(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

Linda Weiss(悉尼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

Meredith Jung-En Woo(密西根大学政治科学系)

John Zysm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科学系)

献给我的父母

超越市场奇迹

与其他经济停滞的非洲国家相比,肯尼亚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增长。在本书中,贝茨通过研究战后肯尼亚的农业发展,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转向作出了极有预见性的批评。作者关注制度的形成,以及它们在肯尼亚农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他不仅考察了制度的经济起源,还考察了其政治起源;不仅分析了制度对市场缺陷的补充,还分析了制度对既定特殊利益的保护。

通过将肯尼亚的例外归因于其经济制度,本书在发展研究领域率先引入了“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然而,作者同时也批评那些“非政治”(apolitical)的研究方法。制度将权力带入了经济生活之中。因此,为了解释制度的影响,经济分析必须用政治分析来加以补充,微观经济学也应该内嵌于政治科学之中。在论证这个观点时,贝茨将肯尼亚随后的经济衰落与其政权的转换联系起来。从肯雅塔(Kenya-tta)政权到莫伊(Moi)政权,经济制度的权力不再被用于财富生产,而是用于财富再分配。这成了肯尼亚经济最终衰落的根本原因。

本书的讨论主题涉及农业发展的公共管制,具体包括土地分配的政治与经济、土地再安置计划、农村财产权、农产品价格政策等等。从资本需求到农产品特征,从政党组织到官僚组织,作者将这些迥异的因素纳入了一个颇有创见的整体分析之中。

作者简介

罗伯特·H. 贝茨(Robert H. Bates)于1969年从麻省理工学院得到博士学位。在加州理工学院升到全职教授之后,他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了杜克大学任教。1993年他加盟哈佛大学,担任该校政府系伊顿讲座教授。他还担任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当今美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发展政治经济学专家,也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贝茨教授对经济史与非洲国家有极深的研究,是研究农业国家如何转型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权威。他在赞比亚、肯尼亚、加纳、苏丹以及西部非洲各地开展过田野调查。他还到过哥伦比亚与巴西做过田野调查,进行过关于国际咖啡业的研究。他的许多著作都是美国大学经济学、政治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物,包括《超越市场奇迹》(*Beyond the Miracle of the Mark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 in Kenya*)、《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ffee Market*)、《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States and Market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y*)、《世纪末非洲国家的失败》(*When Things Fell Apart: State Failure in Late-Century Africa*)等等。

前言

——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

朱天飏

2001年末我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试讲时，题目就是“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看到听讲教师们一脸茫然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是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还是后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第一次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时，都用“政府与市场”作为课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课时也是要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里讲。但几年过去，形势已有所不同，我于2006年初出版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而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设以“比较政治经济学”为课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已经成为常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清华大学的曹海军老师建议和推动，吉林出版集团决定出版这套经典译丛。

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为人所知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边缘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其实这个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人每天的生活，也几乎是大众话题。跨时空比较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应该说早就有了，但真正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还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事。肖恩菲尔德(Shonfield)于1965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一书，将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连接，开创了当代比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先河。后来学者们对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应对政策的

研究更系统地比较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更深入地分析了经济调整背后的政经互动及其模式,于是开创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现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多方法(如比较历史分析和理性选择分析)、跨地区(不仅是发达地区还有后开发地区和转型地区)和跨时间(如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当代全球化的政经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领域。

当然,正是因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铺开面很广,反而难以成形。这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相比最能说明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领域都开创于20世纪70年代对石油危机之影响的研究。前者思考石油危机与美国的衰落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后者分析不同国家对石油危机的应对之策及其背后的政经互动。概括地说,前者探讨国际政治体系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后者则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研究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国家间的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学的一部分,理论层次的争论虽然激烈,但都被整个领域所接受;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经常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研究一个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很少与研究其他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对话,因此缺少几个能够为整个领域所接受的理论范式。我想我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课程、编写教材和主编经典译丛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将这个领域整个展示给大家。

如上所述,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对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的跨时空比较。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也可以放大成为宏观的国家、社会与经济,而国家既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常用的概念,又是一个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国家至少有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在国际层次,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代表领土内人与物的总体,与其相对的是其他国家;在国内层次,国家是指由全职的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力工具,与其相对的是其统治的民众所在的社会;在个人层次,国家是政治家和官僚等个体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与其相对的是其他个体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应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国家主要是指国际层次的国家,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则主要在国内和个人层次上,特别是国内层次。

对国家概念清楚的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读好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不同层次上所面对的不同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的关键。希望这套经典译丛的出版不仅能够促进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在中国的成形和发展,同时也能够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事业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这套丛书开始的选题计划和最后的审校都由我承担(个别非我审校的译著会明确标出审校者姓名)。我希望在此感谢曹海军老师。没有他的倡议和推动,这套丛书是不可能有的。曹老师作为执行主编还承担着很多具体事务性的工作。他耐心细致、温文尔雅,从容解决了各种问题,使我能够专注于丛书的审校。也要感谢吉林出版集团积极推动和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特别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崔文辉先生的大力支持。最后,我要感谢在我比较政治经济学课上学习的所有“孩子”,他们是我在中国推广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永久动力。

2007 年末

于北京大学廖凯原楼

前言

——变化世界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彼得·J. 卡岑斯坦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这里有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运用供给或者需求等经济变量来解释选举或者对外贸易等与政治相关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例如,商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这两种视角可以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概念来说明。基于国家固定的资源禀赋的假设,比较优势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的基石。根据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观点,如果国家能够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而不只是绝对优势,国际劳动分工就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收益。但是,就像弗雷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其他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比较优势概念存在着重要缺陷。这个理论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静态分析。按照它的逻辑,葡萄牙无论在1780年、1880年,还是在1980年就只能生产酒,而英格兰则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学说从1780年生产服装提升到1880年生产重型机械,并再提升到1980年生产计算机芯片,从而因生产类型的提高在生产效率和经济福利上收获巨大。比较优势学说因此固化了一系列用市场语言来表达的政治关系,并且支持了那些导致各国经济不断趋异的政策。

对这个传统经济学概念的挑战来源于对竞争优势的一种明确的政治解释。根据这个观点,无论是葡萄牙的太阳还是英国的资本,每个国

家并不持有固定的资源禀赋。相反,竞争优势学说假设,每个国家经济都在努力增加它们的资本存量、加强它们劳工的技术基础以及促进科技知识在创造新产品和新生产程序过程中的应用。在过去两代人的努力下,亚洲的发展型资本主义成为竞争优势的大展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探讨国家兴衰、寻求解读动荡变迁的领域。

上述两种视点面临着同一个学术挑战:如何将观察到的政治或经济结果和政治或经济解释因素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两者相距甚远的时候。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内,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曾发掘出对经济和政治结果令人注目的解释。但是,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经常紧密相连。这两个学科因此都经历着扩展自己研究范围的冲动,建立在这个冲动上的进一步探索也是人性以及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的认知如何进步呢?因此,学者们不断努力将经济与政治变量融合以获得更强的解释力。

紧随上述学科的融合是有关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学科的内涵问题相比,方法问题是次一级的问题。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统计学与案例叙述并不是天生的优劣易辨。现实通过解释被分类并数字化,定量分析方法已经足够先进,能够将定类数据或定序数据转化成定据数据,并运用高级统计技术进行处理。哪一种方法论策略更合适,应该根据面对的问题而定,而不取决于不变的方法论偏好。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的科学性只能来源于对国家和大型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从而得出解释多种现象的规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需要获得原始数据以及对当事人生活经历的细微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学术局限与限制。自然科学与人文学在现实的时间——不可逆转性、推测性、非线性和非平衡性等特点上是有基本共识的。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大部分定量分析都普遍依赖一般线性模型,其实并不适合用来解释现实的许多重要部分。而另一方面,以案例为中心的定性分析往往忽视对非现实世界的系统质询,无论是通过反事实推理还是通过复杂性理论所提供的模拟方法。因为当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比用于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多得多的分析方法,那些存在于定量与定性分析支持者之间的方法论争论,特别是孰优孰劣的争论,好像变得无地自容了。

现代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崛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早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适应混合经济与社会福利国家所达成的政治妥协,而这种政治妥协则将西方左、右两派的政治极端势力推向资本主义政治的中心地带。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的国家化政治、60 和 70 年代的统合主义政治、80 和 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都游弋于这个中心的左右。上述每个时期都是重大变迁,每个时期都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线索。

同样重要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趋势增加了横跨国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交流的密度。其实,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部分,国际世界已变成了全球的概念,对各种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都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个新的国际和全球背景里,崭新的资本主义与国家模式开始演化,特别在拉丁美洲、东亚、东南亚以及东欧地区,就连中东和非洲也出现了新模式的萌芽。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发展中,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现实中的增加,其分析类型反而变少了。对于研究中国高速发展和新型市场经济的学者来讲,为什么当代学术定式很难在新世纪成功解读中国市场经济的崭新特性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将这个问题当做一种挑战,努力解释这个市场经济史上的伟大试验。

2007 年末
于康乃尔大学

中文版前言

为何中国公民会想阅读一本关于肯尼亚的书呢？我想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本书是利用了肯尼亚的例子来讲更大的道理，其意义不仅在于有助于理解肯尼亚，也有助于理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本书将农业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制度如何约束并塑造了农产品的生产，以及制度如何影响农村与城市消费者的农产品分配。本书探究农村社会政治冲突的起源，主要关注与土地权利相关的斗争。无论是在肯尼亚还是中国，或是别的什么地方，这些主题都是农业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

然而更重要的是，本书超越了市场经济学的研究，而转向了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本书认识到市场失灵的重要性，认识到非市场的制度塑造了人们将土地、资本、劳动投入商品生产的具体方式。本书既关注生产函数，也关注治理结构。有鉴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不可分离，所以本书同时关注交换(exchange)与强制(coercion)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通过阐述这些主题，本书超越了对“市场奇迹”的简单颂扬，而开始探讨全世界转型经济体客观存在的现实。

R. H. 贝茨

2008 年 2 月 29 日

原书新版前言

当本书正在写作的时候,世界上的经济体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但这一波激进主义的浪潮并不是来自卡尔·马克思,而是来自亚当·斯密。从意识形态上看,冲击来自于右派。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的支持者不仅在国内占据了高位,他们还通过他们资助与支配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向海外推行其项目。当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结构性调整的时候,许多社会主义经济体也开始变成资本主义模式。对此,本书想要传达的一个意思便是“要当心”;更深的意义即要指出,在经济现实中国家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像通行解释所说的那种替代关系。

改革者是对的:市场的确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因此,如果要让资源与投资有效动员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话,就必须“把价格摆正”。但是这个论点背后的观点正好对改革者所提倡的议题构成了一种批评:要想让市场中的价格成为经济福利的充分来源,就必须保证有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条件存在^①。这些条件是如此苛刻,以至于无法保证其实现。其推论是明确的:引入市场可能是实现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没人能令人信服地论证引入市场就是充分条件。

在经济改革时,几乎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即使这个观点是源自那些

^① K. Arrow and G. Debreu,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7 (1954):82—109.

改革者自身所持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①。这种沉默表明经济改革的根源也是政治性的——其源头并不来自理论,而是来自意识形态。

价格信号可能是让市场成为福利之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认识清楚这一点并不仅仅是赢得了一场争论,而且还为发展领域的学者与决策者引入了一个新的议题。这个新议题既是基于那些遵循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经济学研究的文献,也是基于本书写作之时已经为人所知的“新制度主义”的文献^②。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对这个新议题予以考察、促进与批评。

新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者并不质疑价格的重要性——他们承认经济激励的力量。但是,他们认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将会降低而非增加社会福利。这种行为的激励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学基本定理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得不到满足,也就是所谓的“市场不完全性”(market imperfections)。对这些不完全性进行研究,就可以认识到非市场的制度所产生的经济重要性,这些制度包括法律、国家、家庭以及企业^③。

新制度主义基本的洞见在于指出强制也是具有生产性的。一

① 参见如下文献中的相关讨论:J. Quick and R. Saposnik,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and Welfare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8)。

② 奠基性著作包括 R.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以及 D.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③ 有帮助的回顾可参见 D. Mueller, *Public Choic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些经济选择会提供短期的私人收益,但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这些选择可能会在长期造成集体的损失。通过施加制裁,制度会让这些经济选择不再具有吸引力。例如,那些在短期从污染中获益的人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可能会发现停止污染也许会更有利可图。而那些享受了道路、学校或公共卫生的好处却又从未贡献成本的搭便车的人,如果受到来自国家的威胁,可能也会重新计算收益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成本。通过改变激励,像法律或国家这样的制度就可以遏制机会主义,从而增强对那些具有社会生产性的行为的有效激励。

在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相关争论中,这种研究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方法来研究发展问题,以纠正这种不足。

另一个目的也影响了本书的写作——那就是要让新制度主义者认识到其知识地位的政策启示,一方面涉及他们究竟如何思考,另一方面涉及他们在政策争论中发挥怎样的作用。通过创造制度,权力进入了经济生活之中。从市场到制度一路走来,经济学家已经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他们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猜想对于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解放市场力量并攻击国家的做法,许多人都不會大喊“犯规”,他们也不会引入必要的制度来让贪婪之心服从于社会福利。

为了写作本书,我回到了肯尼亚,这是一个许多人都认为是最为市场化的非洲国家,去研究制度在肯尼亚经济主导部门——农业中的作用。肯尼亚经济产品中有50%以上来自农业,80%以上的工作岗位也是在农业部门,而农产品出口占到整个出口额的90%以上。在这样一个许多人都期望能找到市场的地方,我却找到了治理结构,这些治理结构让管理者可以进行指导、监督、执行,从而可以组织生产关系并提高资源在农业中的使用效率。我认为这些制度的本质与取向有助于解释肯尼亚的“例外论”——肯尼亚实现了正的经济增长,而其他非洲国家